

目 录

Contents

总 论

绪 言

第一章 清前期江南城镇发展概况

第一节 社会环境的变化

一、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区域经济社会的变动

第二节 城镇数量与地域格局

一、城镇数量

二、城镇发展的地域格局

第三节 城镇空间形态与结构

一、城镇空间的紧凑与扩展

二、城市街区的功能性结构

三、市镇形制及其地理特征

四、开放的空间：城镇间的联系与城市化演进

第二章 城镇经济与市场

第一节 经济形态及其特点

一、社会分工和经济群体的变化	049
二、城市工商业的兴盛	054
三、市镇产业的发展与分化	056
四、几点思考	067
第二节 市场体系与商品流通	072
一、市场类型及其特点	073
二、商品流通的活跃	081
第三章 城镇人口与社会	085
第一节 城镇人口的增长及其来源	085
一、府县城人口	086
二、市镇人口	088
三、城镇新增人口的来源	091
第二节 城镇居民结构	095
一、工商业及相关行业人员	095
二、行政和军事人员	099
三、地主和农民	101
第三节 城镇社会关系	104
一、商匠争端	105
二、土客冲突	108
三、官商关系	111
第四章 城镇管理与社会救助	116
第一节 工商业管理	116
一、宽商政策的实施	116
二、工商业秩序的规范	121
三、民间工商业组织的活跃	125
第二节 社会环境治理	129
一、整顿治安	130
二、引导社会风气	135

第三节 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	141
一、官方救助体制	141
二、民间救助与慈善	146
第五章 城镇教育事业与文化生活	150
第一节 教育与科举	150
一、教育事业的发达	150
二、女性教育和大众教育的活跃	159
三、科第的空前兴盛	164
第二节 社会思潮与文化风尚	169
一、重商思潮的兴盛	170
二、市民文化的活跃	173
三、奢靡风尚的盛行	178
第三节 生活方式与岁时习俗	182
一、靡然向奢的衣食住行	183
二、淆乱旧制的婚丧礼俗	187
三、士庶交融的休闲生活	189
四、岁时节日与习俗生活	193
余论 清前期江南城镇与区域社会	197
一、江南城镇与区域社会演变	197
二、江南城镇与跨区域经济交流	200
三、江南城镇与世界市场	208
四、江南城镇的成熟与局限	209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27

绪 言

清代前期是江南城镇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随着国内政治的日趋稳定，海禁政策的解除，江南与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深和拓宽，陆上、水上、海上的交通线进一步畅通，外向型色彩更加浓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各国的商人、手工业者聚集江南，开展各种商品的交流，自然带动了江南城镇的繁荣。可以说，江南城镇得到了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滋养。江南河道里各式船舶往来穿梭，运输规模进一步扩大，技术水平也随之进步。可以说，河道和海道成为江南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基本纽带。在一些交通便利的水陆交通线上，物产丰足，商品流动量大，于是定期或不定期的市集式商品贸易已满足不了日益发展着的商品经济，作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网络中一个个网点的市镇空前活跃。市场能让沿海自然环境较不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地区迅速转化为商业集散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商业城镇，清前期江南的许多沿海港口在外贸的带动下迅速崛起，周围若干专业性的市镇星罗棋布，成为港口商品的供应地。通过港口，江南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沿海其他港口、日本、韩国乃至海外其他国家。

城镇的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其社会结构更显复杂，社会组织日趋活跃，社会管理也表现出一些新趋向。城镇既是商品集散市场，也往往成为文化事业的集中区，凡教育设施、文化娱乐场所均大量出现于城镇中。城镇是若干学子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他们经常在这里完成初等教育，有的经由科举考试晋升到各层官僚行列。城镇的公共设施日益完善，居民生活越来越市井化，并引领着社会的时尚潮流。明代以来已出现的奢华消费现象在清前期并没有受到显著遏制，反而时常呈现加剧的趋向。

但是清前期江南城镇的发展，充其量只是臻于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化境，尽管在社会风气中已出现了若干新气象，但由于原料的短缺和分工的局限，江南社会仍缺乏向近代社会转化的内在动力。

关于清前期江南城镇的研究，中外学界已涌现了若干名家，像中国大陆的傅衣凌、洪焕椿、罗伦、李伯重、王家范、陈学文、蒋兆成、范金民、陈忠平、陈江、张海英、王卫平等，台湾的徐泓、汪荣祖、熊秉真等，日本的森正夫、寺田隆信、川胜守、鹤见尚弘、石原润、岸本美绪、滨岛敦俊等，美国的施坚雅、魏斐德、周锡瑞、罗威廉、黄宗智、彭慕兰、裴宜理、梅尔清等。

日本学者对中国城镇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如山根幸夫有《中国中世的都市》、北村敬直有《清代湖州府南浔镇的棉织业》、寺田隆信有《明清江南都市的发展》、川胜守有《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石原润有《华中东部明清民国时代传统的市》、《中国的自由市场——苏州地域的事例为中心》等，研究中显示出地域性和个案性，且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美国学者对江南城镇史的研究多受到施坚雅关于中国传统城镇研究模式的影响，有的则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反思。

中国台湾开展江南城镇史研究的历史较为悠长。李国祁有《清代金华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温州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等一系列专题论文；刘石吉于1975年撰写的硕士论文《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后来修改出版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包含《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等若干专题；范毅军对江南市镇的研究则关注地理背景，并于2005年出版了《传统市镇与区域发展：明清太湖以东地区为例，1551—1861》。

中国大陆学者傅衣凌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嗣后樊树志、王家范、何荣昌、叶依能、吴仁安、陈学文、陈忠平、范金民、张华、王卫平、朱小田、张海英、单强等对江南城镇进行了大量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与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学者一起形成了共同开展江南市镇研究的繁荣局面，江南史研究确实成为国内外中国明清史学者共同致力的一门显学。陈忠平、陈学文等还积极致力于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如陈学文编《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等。

整体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江南城镇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一支显学,不少学者多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尤其是针对江南市镇的讨论,显得更为活跃。有学者曾对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加以总结,认为江南市镇研究方面,樊树志、王家范、洪焕椿、陈忠平、陈学文、蒋兆成、范金民、罗仑、吴仁安、朱小田、单强等学者颇有建树,但又风格各异。樊树志对农村集市和专业市镇均有研究,尤为关注市镇网络以及市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王家范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结构及其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独特见解引人瞩目;洪焕椿从剖析明清江南农村综合型产业结构入手,探求市镇经济兴盛的原因;陈忠平对市镇经济类型的划分颇有见地;陈学文长于对江南专业市镇逐一进行详尽的个案分析;蒋兆成将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乡镇作为典型予以研究,试图阐发中国乡镇不同于西欧城市的特点。此外,范金民对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的精致分析,罗仑对江南运河沿岸城镇的深入考察,吴仁安对上海地区城镇兴衰的历史观照,朱小田对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的重点解剖,单强对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的系统研究等,在不同层面上将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①此外,诸如台湾学者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②,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③,龙登高的《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④等相关论著,也从不同侧面、不同时段分析了江南市镇的发展状况与活动形态。

虽然学者们对江南城镇关注的角度与时段不尽相同,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却有着较大的共识。如有关明清江南城镇的发展程度,不少学者持“发展论”观点,认为无论是数量、人口规模、地理规模还是经济形态,明清时期江南城镇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樊树志认为:“进入清代以后,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作为这一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地,作为全国多层次市场中的重要环节,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出现,进入了江南市镇发展史上的第二波高峰。市镇依靠它独特的结构,没有府城、县城那种因循守旧、僵化死板的模式束缚,因而领先于全国各地,开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化的转型,

① 参见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④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尽管这种转型颇为艰难，却极富创造性，在前近代的发展进程中留下影响深远的一页，使江南市镇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淋漓尽致地显露无遗。”^①陈国灿亦认为，明至清中叶，中国古代城镇获得巨大的发展，“工商业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乡村市镇持续兴盛，并越来越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明至清中叶乃中国古代城镇发展的第四次高峰。^②不少学者在强调清前期江南城镇发展的又一次高峰的同时，亦高度肯定了清代江南城镇在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生活文化变迁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认为清前期江南城镇经济不仅出现了“专业化”^③、“城镇化”^④，更意味着“传统的变革”^⑤。

近年来，关于明清江南城镇史的研究还在呈现出继续深化的趋向。如陈江等关注到江南地区的奢侈性生活，思考的问题是“玩物”是否“丧志”、收藏与文化追求等问题^⑥；宋立中等关注到江南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与社会风气^⑦；黄敬斌等关注到江南市镇人的生活收支状况^⑧；安涛、张海英等关注到江南城镇的社会管理^⑨；王卫平、黄鸿山等关注到江南城镇的慈善活动。^⑩这些研究角度堪称新颖，将思考的问题引向了更加生动的实际生活场景。

以上有关江南城镇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我们系统梳理和分析清代前期江南城镇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力图揭

①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② 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 “专业化”是清代江南城镇经济研究中的常见言辞，其较典型的观点如单强所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密，乡镇市场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即乡镇以一种主要产品为中心，形成‘一镇一品’的格局，以生产促进流通，以流通带动生产，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参见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④ 所谓“城镇化”，是指随着江南城镇的发展，其社会形态、居民结构、经济状况、社区布局、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呈现出了“都市化”的特征。参见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古代江南城市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⑤ 樊树志是此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清前期乃江南市镇发展史上的第二波高峰，市镇依靠它独特的结构，开始由传统经济向近代化的转型，体现着传统的变革特征。详见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⑦ 宋立中：《困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⑨ 安涛：《从朱泾镇看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控制的非强制性方式》，《学术论坛》2007年第5期；张海英：《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⑩ 王卫平主编：《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

示清前期这一特定时段江南城镇发展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经济积累的环境、海洋政策转变而形成的有利于江南城镇滋生乃至趋向外向型发展的环境,各地客商聚集而形成的文化交融、相互借鉴的环境等;分析此期江南城镇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探讨此期江南城镇的文化活动和社会生活;总结此期江南城镇发展的历史特点与局限。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江南”一直是模糊的地域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空间范围。大致说来,在古代前期,“江南”的地域范围较为广阔,越到后来则日益缩小。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比较适当的研究单元,既不是府,也不是省,更不用说是整个帝国,而是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所综合而成的经济区域。”^①他依据人文地理学的区域概念,即由事物的内在联系而产生的一系列功能性和波折性的区块,提出一个经济区应当具备四个基本特征,即经济区应当是该地区高层中心地的最大经济腹地;经济区的核心是连接区内各高等级城市主要贸易路线的集中之地,这些线路所构成的网络密度由核心向边缘递减;核心是区内主要经济资源的集中之处;河流流域是决定一个经济区的关键因素。按照施坚雅的这种区域系统研究法,我国学者李伯重认为,明清时期的应天(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和太仓州等八府一州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也是江南的地域范围所在。^②许多研究明清城镇史和经济史的学者,大多采用这一江南地域概念,或者在此基础上略有缩小或扩大。如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③、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等均以八府一州来界定江南地区;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④缩小到苏、松、常、杭、嘉、湖、太仓等六府一州;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则将浙东宁绍地区也包含在内。本书对清前期江南城镇的讨论,结合《江南城镇通史》的基本思路,以苏州等八府一州及周边地区为重点。

①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1977.

②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③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一章 清前期江南城镇发展概况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一度遭受大规模的战乱。在清兵南下的过程中，江南各地的反抗活动至为激烈，所带来的破坏也尤其严重。“反侧时见，处处弄戈”^①；“穷乡隘巷，无不揭竿执田器，自为队伍，保其畔者”^②。战火之余，不少昔日繁华的城镇满目疮痍，成为废墟。如清兵攻占嘉定城后，“肆其杀戮，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城内外死者二万余人”，“僵尸满路”^③；嘉兴府桐乡县乌青一带饥疾盛行，“斗米四钱，人相食”，“十室九空”。^④不过，随着战事的结束，加上清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江南社会很快走向稳定，城镇发展也重新步入正轨，进而呈现出兴盛的景象。

第一节 社会环境的变化

从城镇发展角度讲，清前期江南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就政治领域而言，诸如清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等，对江南城镇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经济和社会领域而言，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活跃和人口增长的不断加速，更是推动江南城镇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兴盛的直接因素。

① 顺治三年三月一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揭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朱子素：《嘉定屠城记》，《中国历史研究丛书》第17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④ 《乌青镇志》卷二《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一、统治政策的调整

清政府在举兵南下，控制江南等地的过程中，面对各地民众激烈的抗争，逐渐意识到必须调整统治政策，改变统治方式，否则很难稳固统治。因此，随着大规模战事的逐渐平息，各种政策的调整便随之展开。对于江南地区来说，主要有弛海禁、重工商、析州县三方面。

（一）弛海禁

清政府在控制江南等地后，为了割断沿海居民与抗清武装的联系，实行大规模的“迁海”政策，堕城郭，烧庐舍，强制沿海居民迁往内地。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下令放弃舟山群岛，规定岛上居民一律内迁，“宫阙、城郭、民居，悉皆焚毁”^①。顺治十八年（1661），又强令东南沿海30里范围内的居民内迁，使原本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呈现荒凉惨象。史载，迁海令下，“沿海之庐舍畎亩弃为荒地，老弱妇孺辗转沟壑，逃之四方者不计其数”^②；“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处于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途……火烧二个月，惨不可言”^③。与此同时，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沿海地区商民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④。规定凡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家产全部赏给告发者；所在地方官员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先告发者，一律处死。自唐宋以来，海上贸易和海洋渔业一直是江南沿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政府的禁海政策，使遭受战乱和“迁海”破坏的江南地区雪上加霜，社会发展严重受阻。

对于海禁政策，部分有见识的官员一直持有异议，认为其实施效果是弊大于利。尤其是郑成功率部东赴台湾后，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抗清斗争趋于平息，清廷上下要求开海弛禁的呼声日渐高涨。康熙十九年（1684）二月初七日，江南巡抚慕天颜在奏疏中明确提出了“海舶通商有利益于民生”的看法。他说：

① 陆圻：《纤言》卷下《舟山》，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

②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三《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补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③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23页。

④ 夏琳：《海纪辑要》卷一，《台湾文献丛刊》第22辑。

